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

普考通

SOCIOLOGY OF ETHNICITY

主办单位: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第 205 期

2016年 4月 15日

目 录

【论 文】

学科如何进步

——对于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发展道路的几点看法 杨圣敏

试议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内涵

菅志翔 何俊芳

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自主性问题

渠敬东

康熙与教皇使者的一次交锋

张国刚

从难民村看在印藏民困境

《参考消息》

☆☆

Association of Sociology of Ethnicity, Sociology Society of China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Peking University

【论 文】

学科如何进步

——对于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发展道路的几点看法

杨圣敏¹

我们把人类对世界的探索划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等不同的领域，这些不同的领域又被划分成数不清的学科，学科是什么？无非是帮我们认识、适应和改造世界的各种工具。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就是这样的几种工具。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在当今形势下，我们如何才能把握好这几个学科的发展道路，少走弯路，更快进步呢？在此笔者想从几个学科之间的关系和学科与社会之间关系等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三个学科的关系

社会科学不同学科之间划分界限的理由，缘于他们研究的对象、使用的方法、分析问题的理论是不同的。而社会学、民族学和人类学在这几个方面则是相近甚至基本相同的。所以我们说这三者是相近学科。特别是民族学与人类学，其实是相同的一个学科，因为这两者在以上三个方面都是一样的，即相同的研究对象，相同的研究方法，同一套理论。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

1. 民族学与人类学都以不同人群为考察对象

对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关系，国际学界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即这两种称呼基本上是指同一个学科。美国称为文化人类学，英国称为社会人类学，欧洲大陆的德、法和俄罗斯等国称为民族学。为什么说两者基本上是一回事呢？

现代意义的民族学和人类学，是起源于西方不同国家的同一个学科。

“民族学”一词作为学科的名称最早出现于18世纪60年代德国的哥廷根大学。以后在德国有两个同义词都指称“民族学”，分别是源于拉丁语的德语形式“ethnologie”和纯德语词“Völkerkunde”。“Ethnologie”由Ethnos（民族、族群、人群）和Logie（科学）组合而成，英文称Ethnology，顾名思义，是以民族、族群或人群为研究对象的学科。²“民族学”这个名称主要被应用于欧洲大陆的德国、法国和俄罗斯等国。出生于德国并在德国学习民族学的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家Franz Boas（博厄斯）曾把德国的这种分类传统带到了美国，但后来在美国较少使用民族学一词，美国学界一般是把民族学与“文化人类学”等同看待。Franz Boas也一直被美国人称为人类学家，而且被认为是当时美国人类学界的代表性权威学者。

在美、英等国，民族学一般被称为“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或“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

“人类学”一词来源于希腊文，由Anthropos（人）和Logia（科学）组合而成，意为“研究人的科学”。英文称为“Anthropology”，它通常被分为研究体质（生物）的人类学（“体质人类学”或称“生物人类学”）和研究社会与文化的人类学（社会或文化人类学）两个部分。而文化和社会都是群体的属性，也就是说，个人的文化和社会属性都来源于其生活的群体、社会环境。所以，无论是文化人类学还是社会人类学，也如民族学一样，都是研究人类不同群体的学科。

¹ 作者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² Vermeulen, Han F., 2008, “Early History of Ethnography and Ethnology in the German Enlightenment, Anthropological Discourse in Europe and Asia 1710- 1808”, pp. 200- 201. Leiden: doctoral Dissertation.

由此可知，在国际学术界，民族学（Ethnology），又称“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或“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是通过对各种不同民族、族群等群体的研究来探讨人类文化和社会的学科。

民族学（或称人类学）研究的“人群”单位，是多层多意的。它可以是以地域为基础的聚落、社区，可以是建立在对某种文化、利益互相认同基础上的跨地域的人群，也可以是以整个文明或现代国家为对象。也就是说，民族学研究的单位，可以是一个民族，也可以是以地域、职业、年龄、信仰、性别、阶级等社会的或文化的界线划分的不同人群（如：山西人、工人、农民、老年人、佛教徒、男人、女人、弱势群体、知识分子等）。更经常的情况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同时包含几个不同层面分属于不同阶层、单位的一个生活群体，一个社会（如：村庄、街道、学校、城镇等）。

2.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田野调查

但以上的说明和解释又太过宽泛。因为所有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都主要或重点以人类或人群为研究对象。那么民族学的独特之处又在哪里呢？简而言之：它的研究重点针对社会和文化，针对当代；它的方法主要是“读社会”而不是“读文献”。即民族学/人类学比较更多地强调对不同人群、民族的社会、文化的研究。在时空观念和研究方法上，重点是通过当代的社会与文化进行实地的调查开展研究。

科学研究是实证性的研究。实证性研究的基础是掌握第一手的资料。（所谓第一手的资料，就是根据亲眼所见或亲身经历所记录下来的资料。）各门学科获得第一手资料的方式是不同的，而民族学/人类学的第一手资料则主要靠实地调查来取得。实地调查又称为“田野工作”（field work）或“田野调查”。田野调查是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最重要的特点。民族学/人类学家将自己在调查中的发现和体验用一种较为细致的方法进行描述、归纳和分析，这主要表现为民族志的撰写。田野调查和撰写民族志，就成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最主要的方法和基本的过程。

3.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也是相同的

民族学和人类学在历史上曾经是以研究殖民地的“异民族”、“初民社会”为主要对象的学科，但是殖民主义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很多学者对全球人类学民族学的历史进行分期时，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称为“殖民主义时期的人类学”，甚至有人直接称之为“殖民主义的人类学”。二战以后，随着全球绝大多数殖民地的纷纷独立，人类学、民族学已经全球性地逐渐转向研究本国、本地、本民族和发达社会。因为已经没有原来那种明确的殖民主义的政治目标，所以被有些人称为“现代和纯学术的人类学”，由于其研究对象大量转向本土，又被称为“地方性的”、“多样性的”人类学。有人预言，未来的人类学、民族学将是在地方多样性研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全球性人类学、民族学¹。可见，从研究领域上来看，研究本土、本民族、主体民族，研究城市、现代社会，已逐渐成为当代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主流²。

任何一个学科都要有其主要扎根和生存的土壤，二战结束后，民族学/人类学生长的土壤已经逐渐变成本土，这是谁也无法回避的事实。还在二战结束以前，著名人类学、民族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给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所写的序言中说：“我认为那面向人类社会、人类行为和人类本性的真正有效的科学分析的人类学，它的进程是不可阻挡的。为达此目的，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

¹ Jan Van Bremen & Akitoshi Shimizu, *Anthropology and Colonialism in Asia and Oceania*. Curzon Press, 1999: 1-10.

² 好比说民俗学和民族学，民俗学和民族学是什么关系呢？我曾去德国的民族学研究所访问，德国学者怎么看这两个学科呢？他们说 Volkskunde（民俗学）就是研究自己的、自己民族的，德国人研究日耳曼人他们叫民俗学；研究其他的、外国的那些民族的、其他民族的他叫 Völkerkunde（民族学）。从德语词汇来看，民族学与民俗学的区别仅仅是一个单数（民俗学），一个复数（民族学），他说我们的理论方法都是一套，在他们那儿其实他觉得就是一回事，他们之间的关系很近。

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当代学者们也认为“在本土研究可能更容易接近真理”。¹也就是说，不管是自称民族学还是人类学的学者，其研究领域都在同步地转变，他们始终扎根和生长在同一块土壤里。

而国内有人说，人类学是研究人类的，民族学是研究民族的，是不同的两个学科。其实这完全是一种望文生义的说法。

1949年以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界的研究领域，曾经是汉族和少数民族并重。但1950-1970年代，人类学和民族学作为一个学科相继被撤销了，所以，当时民族学只能蛰伏于民族问题研究之中。现在，当历史已经拨乱反正，我们就没有必要再将民族学的研究领域局限于少数民族了。而且几千年来，中国的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历来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密不可分，如今更是如此。所以，一个将占中国人口90%以上的汉族剥离出去的民族学，也很难对少数民族社会和文化有很全面和深入的理解，这对学科的发展和民族研究本身都是不利的。

早在1957年，费孝通和林耀华在共同撰写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一文中就提出“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是包括一切民族在内的”，“把少数民族和汉族分开来作为两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是没有根据的”²。1980年，林耀华撰文重新讨论当前民族学的对象和任务时，又把开展对汉族的研究和对世界民族的研究作为“迫切任务”中的两项。³

中国民族学会在20世纪90年代就成立了汉民族分会，实际上中国民族学界对汉族的研究从来没有间断过。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经过多年的努力，我国民族学界在研究国内少数民族的同时，也对汉族以及海外民族作了不少调查和研究工作，并且取得了丰硕的成果⁴。所以，如果再有人把民族学称为仅仅是研究少数民族的，人类学是研究汉族的，显然是全无道理的。事实很清楚，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领域是相同的。

4. 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理论是相同的一套

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重要目标是创建理论。为什么呢？理论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理论可以帮助我们解释现在，指导行动，预见未来。

社会科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人类虽然分为各种各样的人群、民族，但人类的本性是一致的。所以我们各种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社会制度都是人类为适应各种不同的客观世界、客观环境所创造的。既然如此，我们就认为在相同的环境里，人类会有相同或类似的表现。我们把这各种不同环境中人类相应的表现总结出来，就是人类社会普遍性的规律和理论。有了这样的理论，我们就可以比较广泛地认识各种各样人类社会的不同现象。例如：婚姻家庭，流动人口，社会分层，族群关系等，都是把人在不同场景、地位、处境下的表现的规律性总结，这种总结就是相关问题的理论。

而理论是分层次的。自民族学/人类学创建一个半世纪以来，通过对人类各民族、群体各种层面、角度的探讨，学科理论已自成体系。如果按照理论所能够涵盖阐释的时空范围之长短、大小来划分层次，这个体系中的各种理论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宏观层面的理论：这类理论对整个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进行宏观的思考，给以整体的阐释。比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进化论学派的社会发展阶段论等。第二，中观层面的理论：这类理论是探讨人类社会的某个阶段、某一类现象得出的总结，是属于从某一局部或某一时段的历史文化现象中总结出来的理论。比如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研究，学者们分

¹ Xin Liu. *Past and Present: Two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M]//*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Shinji Yamashita, Berghahn Books, 2004: 161.

² 费孝通，林耀华，《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北京：民族出版社1957年版，第33页。

³ 参见林耀华、金天明，“从历史发展看当前我国民族学的对象和任务”，《民族研究》1980（2）：50-57。

⁴ 参见杨圣敏主编，《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报告：1978-2008，民族学卷》第五章，第一节“汉人社会研究和海外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别探讨游牧民族（如蒙古族）、绿洲农业民族（如维吾尔族）、穆斯林民族（如阿拉伯民族）等各种社会文化特点的总结等。第三，微观层面的理论：这类理论是对某个具体的社会文化现象作细致的研究。例如某个节日（中国的春节）、风俗（如某个民族的婚俗）、某种行为或仪式（如礼物之交换）、关系（如夫妻关系）的研究所进行的理论阐释。这些理论所涵盖的时空范围更狭小，所以我们把它称为微观层面的理论。

理论还是分为不同角度的，是需要互补的。我们的世界无限广大，不断变化，复杂万象，而且事物都是多方面的。单独的个人或是有限的时代都无法解释清楚这个世界的面貌和本质。因此，我们的研究需要有不同的角度，需要互相补充，才能认识事情的全貌。也就是说，理论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工具，工具越多越好。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创建理论，创建理论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世界的问题是无限的，作为解决问题的工具也是越多越好。

一个半世纪以来，民族学/人类学创建的理论由于层次角度不同，林林总总，不胜枚举。其中影响最大的理论往往被称为理论学派。这样的学派包括：19世纪中叶创建的进化学派；在进化学派之后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出现的传播学派；20世纪初以美国的博厄斯为代表的历史学派；此后以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到了20世纪60-70年代在西方又流行结构主义学派。

所有这些影响重大的理论都既是民族学的理论，也是人类学的理论。所以说，民族学与人类学的研究理论是相同的一套。

综上所述，民族学与人类学的学科理论、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都是相同的，他们其实就是同一个学科。

5. 学理之争还是位子之争

如上所述，在中国同时有民族学和人类学两个学科名称，最初是由于译自西方不同的国家和语言¹。在欧美国家尽管称呼各异，但一般来说并不存在名称的争议，因为每个国家在国内都沿用自己传统的同一个称呼。但在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因为这个学科都是来自西方，所以都往往有类似中国这种同时存在两种称呼的情况。如在日本国内，也是同时有这样两个名称。日本学界一些人认为，日本民族学的研究比较重视个案和深描，人类学则更重视对案例的对比分析，也更国际化。与欧美国家不同，日本和中国国内都为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关系争论不休。

1994年，日本民族学界有人提议将“日本民族学学会”的名称改为“日本文化人类学会”。主要的理由是，这两个名称其实是同一个学科，在大学和研究所里，用人类学的名称更好确定课程和研究课题的名称，也可以加强跨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再者，用人类学名称会让更多人认同这个学会。这个提议是在日本民族学会接待了一个大型国际人类学会议以后，很多人希望日本的民族学更国际化，与国际接轨。² 当时日本民族学会的会长说，民族学这个名称太陈旧，这个名称已不能代表这个学科实际的研究领域的性质，而且现在日本多数大学的课程和研究所的研究都已改用人类学这个名称。但支持和反对改学会名称的两派人争执不下，1994年10月学会召集大会进行投票表决，结果是反对改名的人以超过50%的微弱多数票获胜。反对者的理由其实并非是学理上的，他们主要的理由是，如果扔掉已经用了60年的民族学名称，就等于否定60年的学科历史，特别是，如果民族学改为文化人类学，这就等于降低了学科的地位，民族学家们的个人名誉地位也会因此而受损失。同时，多数人也不愿意看到该学会分裂为两个学会，不希望分裂为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两支队伍，那样对学科的发展和每个人都有不利的一面，那时个人的研究范围可能会限定在某一个狭小的范围内，也就是大家都不愿意失去在更大范围内从事研究的可能

¹ 例如，德国最著名的马普民族学研究所挂着英、德两种文字牌子，德文写成“Institut für Ethnologie”即“民族学研究所”。同时，牌子上的英文写成“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即“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² Aoki Tamotsu. Hangakumon no susume[M]/Recommending semi-scholarship.in Bunkajinruigaku no susume. Invitation to Culture Anthropology. ed, Funabiki Takeo. Tokyo: Chikuma Shobo, 1998: 64-74.

性。这样，日本民族学会更名的建议没有获得通过。¹ 日本学界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两个名称和名称之间关系的争论让我们看到，这主要不是一个学理的争论，而是出于不同学术团体、单位和个人的资源、利益和名誉等方面的考虑。到了 2006 年，日本学界再次召集针对这个问题的研讨会，终于通过了将名称统一更改为人类学会的决议。这样的更名也让我们看到了美英比欧洲大陆更强势的文化地位在日本的体现。

中国学界在民族学与人类学到底是一个还是不同的两个学科的争论也持续了多年，与日本的情况类似，其实主要也不是学理的争论。有国外学者明确指出，这其实是“争位子”的辩论，是已“走入死胡同”的辩论，从学理上看是没有意义的。²

中国老一代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有明确的态度。如费孝通先生说：“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份不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这一点很重要，我并没有因为学科名称的改变，而改变我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我的研究工作也明显地具有它的一贯性。也许这个具体例子可以说明学科名称是次要的，对一个人的学术成就的关键是在认清对象，改进方法，发展理论。别人称我作什么学家是没有多大关系的。”³

实际上，这几个学科在西方国家经过一百多年的独立发展，现在已逐渐走向互相的渗透与联合。如在西方有的大学，将社会学和人类学合建为一个系，称为人类学与社会学系。而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国际学术界早已将其基本归为一类。费孝通先生在 1992 年将北京大学社会学研究所改名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后说，这三个学科构成了一条江水，“我们都是同饮这条江水的人”。“这三个学科都是研究人文世界和人类的社会行为的，三科是一个集团。”⁴

一百多年来，这几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和研究领域都在不断发展变化，其中一个重要的趋势是更多地转向对现代社会、主流社会的研究。而当代社会的复杂性又推动这种研究不断扩大地去借用其他学科的知识，不断互相交叉与联合来研究共同的问题。⁵ 这都提醒我们，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学科将日益走向联合而不是更清楚的分界。

6. 民族学人类学的不断分支

一个半世纪以来，民族学人类学研究的领域、角度和对象都在不断扩大，其分支学科也随之不断增加。

研究地域的扩展

传统的民族学曾经以“初民社会”，以海外、边疆、乡村的人群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当代人类社会正快速的走向城市化。如今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已达到 70% 以上，从全球看，一半以上的人口已居住于城镇中⁶。民族学如继续以乡村和边疆为主要对象而回避城市，显然会脱离对多数人群的研究，也难以站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沿。于是上个世纪 60 年代，都市人类学产生了。对复杂的、都市社会的研究，又推动民族学有更多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的扩张。如，对城市

¹ Sidney C. H. Cheung. Japanese Anthropology and Depictions of the Ainu[M]//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Shinji Yamashita, Berghahn Books, 2004: 136-151.

² Xin Liu. Past and Present: Two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M]//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Shinji Yamashita, Berghahn Books, 2004: 152-183.

³ 费孝通. 人类学与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M]//转引自乔健. 中国人类学发展的困境与前景. 载杨圣敏主编.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选.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403.

⁴ 杨圣敏. 费孝通先生对学科建设的指导[M]//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选. 北京: 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457.

⁵ Xin Liu. Past and Present: Two Moments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thropology [M]//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Edited by Shinji Yamashita, Berghahn Books, 2004: 152-183.

⁶ 1993 年 5 月中国召开第一届都市人类学会议时，国际都市人类学会主席安萨里先生曾在会上预言：“在下一个世纪到来之时，世界所有地区将程度不同地实现都市化，农村生活如果那时还未完全消亡的话，无疑也将变得微不足道。”见李德誥主编，《中国都市人类学会第一次全国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国物资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3 页。虽然他的预言今天并未完全变成现实，但我们看到，如今，随着现代化的加快，城市人口比例增加的这个趋势还在快速发展着。

的流动人口、社会结构和社会网络、家庭结构和生产方式、民族关系、城市环境、文化认同与冲突、妇女问题、贫困问题、宗教功能、都市街坊生活中涉及民族因素的研究等。

研究内容的开放

实际上，在各种学科中比较，民族学或人类学有这样的一个特点，它的研究方式和研究对象决定了它是一个完全开放的学科，它是在几乎所有方面都对其它学科的影响开放的学科。这是民族学/人类学一个突出的特点。它的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到其它所有学科的知识，既包括社会科学的，人文科学的，也包括自然科学的。它的研究越深入，这种联系就越多。

现在，随着这个学科的发展，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民族学/人类学分支学科陆续出现。例如，与其它社会科学有关的心理民族学（心理人类学）、法民族学（法人人类学）、教育民族学（教育人类学）、语言民族学（语言人类学）、政治民族学（政治人类学）、经济民族学（经济人类学）等；与自然科学有关的生态民族学（生态人类学）、生物民族学（生物人类学）、医学民族学（医学人类学）等；与技术有关的如计算机民族学（计算机人类学）、影视民族学（影视人类学）等；与人文科学有关的如文学民族学（文学人类学）等，不一而足，而且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还会不断增加。

为什么民族学、人类学有这样一种开放的特点呢？因为它研究的是人、人群、人群关系、人群的社会与文化，所以与人有关的方方面面都会涉及和探究，只有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探索、观察、分析，才可能有更准确的解释和科学的判断。

这种发展的趋势，也在推动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越走越近，而不是越走越远。

（二）民族学与社会学的关系

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学与社会学几乎是同时在西方国家产生的。社会学的创建主要源于对西方本身的社会问题研究，因此过去曾被认为是以研究西方的现代社会、复杂社会、城镇和较大规模的工业社会为主的学科。而民族学是研究西方以外的殖民地的“初民社会”、无文献的小规模农业社会为主的学科。

这两个学科的研究内容既有重合之处，如都市人类学/民族学、社区研究、流动人口、社会分层、乡村社会学等，也各有不同的侧重。社会学重点针对不同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开展研究，力图从中总结出现代社会一些共同的规律。民族学的研究则侧重于不同族群和社会的文化特点，力图阐释这些特点存在的原因。这两个学科的差别主要在研究方法上。是不同的研究对象和关注的侧重点，造成了不同的研究方法。

传统民族学研究的是小规模、无文字的族群，研究对象的单元之间同质性很高，适合那种场景和研究对象的方法就比较直观。主要是近距离观察，记录和参与其日常生活，然后写下这种文化的民族志，它强调局内的参与观察，即深入所要研究的社区、人群、民族中进行比较长时间的观察、体验，并据此对其进行分门别类的详细描述，进而开展定性的分析和解释。

社会学研究较复杂的现代社会，社会多样且规模较大，同质性低，所以需要更为复杂的定量的方法去进行调查和分析。针对大规模复杂社会，社会学的典型方法则是依靠问卷等形式搜集大量的定量数据，所以，抽样调查，进行统计和量化分析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基础。在微观和中观层面也创建了更多针对现代社会的理论。

这两个学科从事研究的出发点不同，归宿也不同。民族学要探究文化的影响、作用，它的侧重点是人类各群体的文化。如习俗、观念、宗教、行为规范等。社会学以社会问题为重点，目的在于社会矛盾之解决。社会学主要研究的题目，如，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基本社会制度，亲属制度，社会分化和分层、社会控制、社会整合、社会变迁、社会冲突等。

以上所述都是在二战以前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特点和差别。二战以后，以上特点和差别则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变化的方向就是这两个学科越走越近了。

上世纪 20 年代，一批自西方学习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学者回到中国，在开展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后不久，就提出了这些学科必须本土化才可能真正在中国应用和扎根。本土化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将这两个学科的理论方法综合应用。如，曾担任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吴文藻先生早在 30 年代就说：“在作者看来人类学、社会学实在是二而一的东西，尤其在中国应该如此。”（《边政发凡》，载 1942 年《边政公论》第一期）为什么在中国应该如此？中国没有殖民地，人类学是研究殖民地的，而中国没有殖民地，都是研究自己本土，因此他认为社会学和人类学在中国是一回事，所以他就创新一种方法叫社区研究，社区研究是什么方法呢？就是把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做研究。后来英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学者、人类学家 Maurice. Freedman 给中国社区研究非常高的评价，他说：“中国的社区研究应该是人类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章，这是中国人类学界社会学界对人类学的一个贡献”（*Sociology in China: A Brief Survey*, 1962）。中国学者把这两个学科结合起来做研究，他认为这是非常进步的，是一个创新和贡献。为什么呢？因为不仅在中国是如此，在所有非西方的、没有殖民地的发展中国家，将人类学/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开展研究都是一个必然趋势。

到了二战结束以后，这样的趋势就不仅呈现于发展中国家，而且也很快成为世界性的趋势。二战以后，殖民地纷纷独立，以研究殖民地为主要目标的人类学/民族学必须适应这个现实。于是，民族学/人类学生长的土壤逐渐变成本土。因此，马林诺夫斯基说：“研究人的科学必须首先离开对所谓未开化状态的研究，而应该进入对世界上为数众多的、在经济和政治上占重要地位的民族较先进文化的研究。”

1949 年新中国建立以后，从 1950 年代到 70 年代，国内民族学研究的领域一度缩小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可是当今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面临的问题也越来越复杂，传统的民族学的方法已经不够用了。一个简单的例子，现在少数民族流动人口达到了 3000 万，也就是说，五分之一以上的少数民族人口在流动。在上世纪 80 年代以前，城乡之间基本没有流动，现在全国每年的流动人口达到两亿三千万。少数民族大量进入东部、进入城镇，汉族人口大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所以有学者说，我们民族关系的现状，过去是各民族背对背，接触很少，现在是各民族面对面，接触很多了，问题就复杂了。不仅在中国是这种情况，世界也是这样的趋势。第三世界由过去比较封闭的状态变得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也比过去复杂的多了。这是世界大的趋势，所以将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综合起来开展研究的民族社会学就顺应这个趋势产生了。这个学科利用过去研究现代的城镇社会发展出来的理论和定量的方法来研究过去传统上由民族学研究的边疆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问题。这就把社会学研究的领域扩大了，而同时，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领域也进入了城镇，并且出现了都市人类学/民族学这样的分支。可见，半个世纪以来，在全球范围，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逐渐合流已是大势所趋。不顺应这个趋势，就很难做好研究。

因此费孝通先生说：“在我身上人类学社会学一直分不清，而这种身份不明并没有影响我的工作，这点很重要，我并没有因为学科名称的改变而改变我研究的对象、方法和理论，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人类学家，或者说我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或者说我作为一个民族学家，我用的理论和方法都是一套。”（“关于人类学在中国”，载《社会学研究》1994 年第 2 期）他说“学科名称是次要的，一个人的学术成就的关键是认清对象、改进方法、发展理论、别人称我是什么家是没有多大关系的”。

实际上，老一代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已经把这些学科综合到一起，把理论和方法综合起来做中国社会的研究，现在国际上不仅是社会科学各学科在互相渗透、借鉴，自然科学的大趋势也是这样，学科在互相交叉、互相借用。好比说最近三、四十年一个简单的统计，大家也都清楚，诺贝尔奖得奖人的研究题目多是在几个学科的交叉点上，多不是单一学科的研究成果，多是借鉴几个学科的研究理论、方法来攻克一个问题。这就说科学的发展需要淡化学科界限，多借用其他学科

的理论和方法开展研究。我们为什么把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放在一个学院里面？为了让学生有更开阔的眼界，多学一点其他相近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为什么让不同学科的老师们在一个学院里面？为了让他们能够互相合作和借鉴，多种方法互相合作来阐释攻克一种社会问题。这是学科顺应社会发展形势所应走的正路，是我们几个学科不成为空洞的玄学，而是能够解决一些实际的社会问题，为社会做一些实际贡献的必然之路。

二、理论导向还是问题导向

一般来说，我们的研究可分为两类：（一）以验证某一理论为目标的“理论导向的研究”；（二）以解决某一社会实际问题为目标的问题导向的研究。有人认为，理论的研究是学问，是科学；而具体社会问题的研究鸡零狗碎，太繁杂平常，不是做学问，不是科学。这种思想是错误的。

马克思说“科学只有从自然出发，才是现实的科学”，也就是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最终会发展成为统一的科学。社会科学只有借鉴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与自然科学融为一体，包括广泛采用数学的手段，朝着精确性、客观性方向发展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根据这个标准，社会学比民族学、人类学更多应用统计、问卷等量化的方法，是它的优势。然而，是否就可以说社会学比民族学/人类学更科学呢？试想，如果没有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去开展深入的访谈、观察来搞清楚研究对象的性质，如果没有这一步工作为基础去判断一些问题的性质，问卷中的问题设计就可能有方向性的偏差，在这种基础上的统计再准确也是不可取的。所以我们说这两个学科的方法各有长短，要互相取长补短才是最可取的研究路径。民族学、人类学的方法主要是定性的调查、访谈、观察，所以有学者认为它还不够科学，因为它的方法理论还不够精细。总起来说，现在不论是民族学还是社会学都离马克思说的目标很遥远。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只有实践即问题导向的实践，不断在实践中检验已有的理论和尝试新的方法，创建新的理论去解决社会问题，在解决社会问题的过程中发展这个学科。

对于理论导向的研究来说，我们要检验的是哪些理论呢？如所周知，我们这几个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基本来自西方，西方来的理论和方法当然是有借鉴意义的，近一个世纪以来，国内学者用这些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很多探讨。但仅靠或者主要依靠这些理论，是不能完全解决我们的问题的。例如，虽然美国学者也研究民族关系问题，并且总结出了很多理论，但我国的民族关系现状与他们的状况是不同的，中国的族群文化区隔与美国的族群差别很大，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比如中国的民族自治区制度，中国民族关系的悠久历史都是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所以，仅靠西方总结的理论、方法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我国学者运用西方这些理论对国内民族问题进行分析时争论激烈，分歧很大，原因在哪？就是脱离实际地用已有的理论去进行逻辑推理的结果。解决中国民族问题应该用什么理论、怎么归纳这些理论？对此问题，目前学界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混乱状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关于少数民族发展道路的问题上，少数民族应该怎么发展其社会、经济和文化？有的人主张用进化论去分析和解释，认为少数民族观念比较落后，比较狭隘，科学技术发展比汉族落后，所以要加快发展的脚步，如果少数民族抵触这种发展就是狭隘民族主义。另一种持文化相对主义观点者认为，少数民族是“被现代化的”，文化本没有先进落后之分，少数民族不一定必须去学习汉族文化，不一定必须去实现现代化，如果强迫少数民族进行现代化就是大汉族主义。

其实发展道路问题并不是这样的理论或者类似的一些理论能够解决的。所以，我们从西方已有的理论中找不出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的办法，也就是说在学科已有的理论库中是没有答案的。所以要解决我们现实中的民族和社会问题，除了借鉴西方的理论之外，更多的还要靠我们自己到实际中去总结，到现实的边疆民族地区去调查和总结。

我国民族问题的研究长期未能总结出有针对性的理论，还与学界的理论研究长期缺乏与实际相联系的传统有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知识界是一个以读书人清高自居的士人阶层，其学术研究也往往超脱于大众和社会实际。这些思想在当今的知识界还是有影响的。在历史上，中国文人关于学术研究的目的分为两种，一种叫经世致用，比如“齐家治国平天下”、“格物致知”，也就是追求实践出真知；另一种是修身养性，学术界称为心学派，这些人把读书做学问看作是超脱于普通民众的事，他们持一种读书人应超脱于社会政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在一部分人中是根深蒂固的，至今仍是如此。上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民族学和社会学界曾有一场争论，即这两个学科在中国初步建立起来以后，如何在社会中定位？也就是说，这些学科从事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有两位著名的学者，一位说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另一位说是“为兴趣所驱去研究”。费孝通先生则持不同的看法，他说，你们觉得自己很超然，你们不要忘了，做学术研究也是有社会责任的，我们的责任就像农民种地，就像士兵打仗的责任一样，关乎社会的进步与生存。他认为社会科学的目标就是控制社会变迁的方向。他说，我们无法阻挡社会发展的脚步，可是我们可以想办法控制它走的方向，让它朝好的方向去走。所以我们的这个学术研究是为社会服务的，是一种工具，我们的理论也是工具，其目标是解决社会问题。¹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分析边疆民族地区问题的理论工具不够。我们的边疆民族问题比较复杂，像新疆、西藏这些地区民族问题很严重，可到现在却找不出有效解决的办法和政策。从学者的角度来说，我们是有责任的，很多学者批评政府官员，称他们没有尽到责任，其实我们自己也没做好，我们在理论上就没有研究清楚民族到底是什么、民族的本质是什么、宗教的本质是什么，学界在理论上没弄清楚，没做好自己的研究，怎么让政府去制定应对这些问题的合适的政策呢。所以说，我们只能下更多的功夫去研究具体的社会问题，从中总结出更多的理论工具而不是一味的用已有的理论去生搬硬套、生硬地解释，生硬地，纸上谈兵地去做理论导向的研究。

为什么过去国内学术界问题导向的研究不够，理论总结少？这几个学科，从西方传入中国已经 100 年了，到现在为止，我们课堂上所学习的理论方法 95% 以上都是西方的东西。为什么我们自己一直身陷其中走不出来，我们在中国做了大量本土的研究，可是我们发展不出自己的理论，这是为什么？除了脱离实际以外，我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学界失去了自信，被西方人给打怕了，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行，只迷信西方的理论。一开始还是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学西方的技术、自然科学，但这样还是失败，只好把自己的传统都丢掉了，连自信一起丢掉了。于是，不仅自然科学学西方，社会科学、社会制度和观念都全盘照搬西方的，所以中国学界就不再自信，不仅老几代人不自信，年轻人也缺乏自信，不信自己也能创建理论，只相信西方。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的表现就是认为西方的理论都很经典，都是真理，完全用这套理论去阐释我们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用这套理论去评判我们的社会，其结果有对的，也有错的。

我们不能很自信地去从中国实际出发去独立地判断和总结理论，缺乏这种独立的问题导向的研究，我们就很难有理论上的创新，建设适合中国社会的学科理论和方法，也难以对现实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与总结。

我们这个学科是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应用性是我们的一个优势，这个优势发挥出来了学科发展就快、社会认可度就高，否则就会被社会所忽视。在我们的学科史上是这样，国际上也是如此。我们在总结中国的民族学 100 年发展道路的时候，特别是从 1949 年到今天这几十年里，一些学者在各种学科史的回顾中，发泄了很多哀怨之气，怨社会对我们不理解。怨政府在五六十年代就把社会学、人类学撤销了，说这是资产阶级学科，当时民族学虽然保留下来了，到了 1957 年以后也撤销了，说民族学是修正主义的。这几个学科为什么被撤销了？除了政府对学科不了解，社会对这个学科不了解之外，应该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这个学科的学者

¹ 费孝通，《1937 年“再论社会变迁”》，载《费孝通文集》（第一卷），群言出版社 1999 年，第 507-508 页。

们集体性地回避中国社会最焦点热点的问题，没有参与事关国家民族命运的问题的研究，更不要说去设法解决这些问题。从更长的时段上来说，这个学科对中国社会的贡献很小，始终没有拿出能够有效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没有拿出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工具，即学科中国化的理论。

1949年6月，北平刚刚解放，当时在燕京大学民族学系主任林耀华教授家里，开了一个学者的座谈会，费孝通、吴泽霖、雷洁琼等很多著名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都参加了座谈。目的是总结学科以往的经验教训，探讨今后的发展道路。为此他们回顾了解放前半个多世纪社会学、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他们总结说，“以前的研究是不为大众服务的，也不为统治者所重视，也有求客观之名，但更多是逃避客观之实”。解放前的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根本不研究社会焦点、重点问题，他们都是研究边边角角的问题。当时社会焦点的问题是国共的战争，他们全部回避。回避了社会焦点，只对中国社会边边角角的问题做一些研究，于是这个学科对社会产生的影响非常小。所以，解放以后社会各界都认为这个学科没有用，再加上所讲的内容都是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理论，就被扣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政府就将其撤销了。现在回想起来，学者们对于这个被撤销的结果也是有责任的，因为你们研究了几十年，只是研究些边边角角的小问题，或是空谈西方的理论，不研究中国社会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焦点问题，研究了几十年也没有发展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方案和理论。到了解放以后应该怎么样发展？在1949年6月的那次座谈会上，大家总结说“要以问题导向培养学生，问题导向发展学科，针对中国实际问题之解决，谋求学科之发展。培养既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能力的学生，要培养学生能担当实际问题解决的责任和能力。”归纳起来就是，淡化学科界线，重点解决实际的社会问题。学科理论和方法应该在解决实际的问题中得到总结和发展，学校的教学也要在这种实际问题的调查研究中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句话，就是问题导向，才能发展学科。¹

解放以后，虽然社会学、人类学两个学科被撤销了，但是这些领域的学者还在，并且多数人都参加了全国范围的民族大调查，这是非常辉煌的一段历史，现在的学科史不断地强调这段历史对国家和学科的贡献。但是，我们也需要总结一下那段历史中我们的不足之处，就是缺乏对当时的边疆民族社会问题的深入探讨和新的理论总结。民族大调查，现在分析起来，其实是一个理论导向的调查。因为指导这个大调查的理论是马克思、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社会进化理论，用社会进化论去分析少数民族社会，用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历史和案例来证明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阶级斗争理论是对的，仅此而已。所以对55个少数民族的调查，有将近一亿字材料，出版了180多本社会历史调查书籍，都是用这个理论，这是理论导向的调查。这种理论导向的调查并没有很好地探讨当时边疆少数民族社会中的一些具体问题，自然也没有提出解决的办法和总结出新的理论。所以到了1957年中苏关系开始恶化以后，政府认为这个学科也没什么用，就将这个学科也给撤销了，改为“民族问题研究”。因为民族学没有贡献，在理论上没有拿出新的工具，没有发挥学科的特点，就被撤销了。

不仅仅中国的民族学、人类学存在这样的缺陷，当时苏联的苏维埃民族学也是类似的一种情况。苏维埃民族学的特点是重视历史的角度，重视宏观角度的分析，以民族为研究对象，以政府的民族问题理论为指导。这个学科在边疆地区做了大量调查，出版了大量著作，但这些著作也是理论导向。其主要目标并不是通过调查研究解决边疆地区的社会和发展问题，而是用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发展的调查报告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证明社会发展阶段论是正确的，证明阶级斗争理论是正确的。当然，那个时候有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当时，苏联与西方的斗争很激烈，学者要配合政府，配合这些政治斗争。可是它没有问题导向的研究和总结，单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用大量的案例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宏观理论。因此苏维埃的民族学和人类学，针对当时

¹ 见杨圣敏、胡鸿保主编，《中国民族学六十年》，第25-27页，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3年。

苏联社会主义社会中各种具体和现实问题的研究和理论总结很少，发展很慢，苏联一解体，民族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现在，俄罗斯的民族学、人类学转而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的那些理论，苏维埃学派留下的理论遗产并不多。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民族学、社会学在国际上分为两大体系，一个体系是西方传统的体系，在西方占主流地位，另一个体系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学、社会学。在前苏联，苏维埃民族学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一个代表，但它不去研究解决社会主义时期的实际问题，只是用历史和现实来证明马克思主义已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和阶级斗争理论，完全是一种理论导向的研究，并不想在理论方法上有所创新，所以才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现在，俄罗斯的社会学民族学界全盘接受西方主流的人类学、民族学理论，基本上是跟着西方走。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苏联学界的经验，不重视问题导向研究的教训，值得中国学界认真汲取。

三、 如何产出更有深度的成果

如何产出更有深度的成果，在理论上有所创新呢？我认为有两点是我们要做到的。一是学科更加开放；二是每个人的研究更加专门和集中。

先讲第一点：学科更多的开放与合作。仅仅靠传统的民族学、社会学自身的理论方法是不够的，还要向其他学科开放，学习其他学科的分析理论和研究方法。学科开放是问题导向的研究中取得创新性成果的必由之路。不仅我们这个学科如此，其他学科也是如此。

现代科学发展初期的特点是将研究的领域划分成一个个范围比较狭窄的学科，这有利于在每一个点上会发现积累更多的信息，有利于研究的深入。可是这种过分的学科细化，也有不利的一面，即当你单独从某一角度去做研究的时候，很容易只见一斑、难窥全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像盲人摸象一样，轻易地以为一片树叶可以代表全局。事实上，任何实际的社会问题，都比理论要复杂得多，所以真正要做好问题导向的研究，你必须从多种理论、多个角度出发，运用多种方法才可能揭示这个问题的真相，进而把这个复杂的问题分析的比较清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各学科之间互相开放、交叉才能有所进展。有人做过统计，近百年来诺贝尔奖的 334 项成果中，近半数都是学科交叉融合的结果，都是在几个学科的交叉点上用多种学科的方法做那个问题的研究。其实民族学、人类学在过去，也往往是借用其他学科的一些理论我们才有所创新的，例如进化学派最初是借自生物学的理论，结构主义是借鉴了语言学的理论等等。

我自己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实践：我在做民族关系调查的时候，民族学原来传统的方法就是访谈、观察和问卷。可是人的态度是分为外显和内隐两种的，比如说话、各种表情、动作，你通过访谈、观察、问卷可以把这些调查出来。可是他内隐的、潜意识的、内心的想法，我们这个学科的方法是往往调查不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与心理学结合去做调查，才可能把内隐的一面揭示出来。对中国社会多年的调查与研究实践清楚地显示，我们现有的理论方法是不够用的，不足以把事实揭示清楚，也不足以把问题分析透彻，我们应该有意识的去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与理论才能在研究中有所突破和创新。另外，我们在办学的时候也是这样，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们把传统的系都改成了学院，学院这个方式是好的，就是让相近的学科能在同一个单位里面，学生可以听听本专业以外的相近学科的课，老师可以和本专业以外的其他专业的人合作做研究。

其实，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学者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有了这样的认识。吴文藻先生说，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之间的学科界线将逐渐淡化，并终将逐渐统一。在他看来，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实在是二而一的东西”。又说，过去将民族学/人类学与社会学的研究领域划分的说法“已渐被废弃，最近两种学术日益接近，不久定将混合为一。因为二者所研究的目的、题材、观点及方法越来越趋于一致，几乎无分彼此，所谓文化社会学与文化人类学不过是异名同

义的词。”¹ 吴文藻先生开创的社区研究法，就是把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做中国社会的研究，费孝通先生也是完全相同的做法。老一辈学者们通过一生的研究总结出来的道理就是只有多学科合作才能有所建树，只有在问题导向的研究中间，才可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并进而发展中国的民族学与社会学。

第二点，长期集中于一点的研究。我在这个领域里学习、研究 30 多年来有不少体会，其中有一个重要体会就是作为个人来说，应该做长期集中于一点的研究。我们经常讲我们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应该从各个方面全面了解社会，全面了解各个方面的问题，而作为个人你怎么去全面了解它？你是不是说这个月我研究蒙古族，下个月我研究藏族，不久我又去研究维吾尔族；我到处去跑，今天我在新疆，明天我在云南，后天我又去哪儿，各个方面我都要去做研究，作为个人是不是这样做研究？我觉得这样做研究未必能做得好，我自己的经验就是长期集中于一点的研究方法才可能做出一个有深度的成果。要长期集中于一点，如何集中呢？第一个，集中于一个社区、一个民族、一个区域或一个人群，这样的一种研究。第二，集中于一个角度的研究，如集中于经济角度的经济人类学、环境角度的生态人类学、历史角度的历史人类学或流动人口研究、妇女人类学的研究等。为什么要长期集中于一点开展研究呢？有人说你老是在一个地方做研究，你的思路就很窄，我不反对这种观点，因为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的研究都有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要比较，主张集中并不是不比较，一定要比较，你要到其他地方去、其他的问题也要研究，也要了解其他人的成果。可是我们看其他的研究不是为了分散，就是为了跟我自己集中研究的那一点、那群人、那问题作比较，以便更深入全面地分析我自己要研究的问题。为什么要集中？因为我想我们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最高目标就是研究人性，其实最高目标就是了解人到底是什么，你了解了人的本性，就能明白不同社会的人为什么要那么做。因为不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男人还是女人，维吾尔人还是蒙古人，古代人还是现代人，2000 年以前的人和现在的人，他们的本性都一样，都没有变，生下来的本性是一样的。儒家说“人之初，性本善”，法家说“人之初，性本恶”。不管怎么说，人之初都是一样的。如果本性不一样，我们就没有人类学，就没有社会学，我们就没有国际上大家通用的一些人类学理论。但人为什么又有不同的表现？因为他们所处的环境不一样。

你在一个点上作深入的研究，不仅仅是两个月、三个月在一个点上，而是 5 年、10 年、甚至 20 年地长期在一个点上，重点地在一个点上做研究，你才能深入地了解人性、人之间的关系。这样帮助你剖析很多大的问题。了解了人性、人的本质，人在各种环境、各种矛盾冲突中的行为规律，你才能理解为什么人要抱一个“团儿”结成民族？人为什么要信仰宗教？也才能帮助你解决、剖析、理解那些大的社会问题。所以说虽然是很窄的一个点，在这个点上长期深入的研究，最后帮你理解的是人类大的问题。在这个点上你深入了解了人性，人的行为规律，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学者们总结的各种理论，因为那些理论都不是超人的，都是对人性在各种关系、事情、场景和环境中的总结。

后现代论者像格尔兹这样的一些人，他们总结学界过去研究中的一些缺陷、一些经验，他认为过去的研究比较肤浅，不太可信。那么，今后我们的研究应该怎么做？他认为应该更深入地去观察和厚重地描述，把这种方法称为“深描”。怎么样深描呢？我想不仅仅要深描一个社区、一个小社会，其实最重要的深描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深描人的本性，通过你研究的那个点、那个人群，长期地深入地去了解他们，深描人的本性，通过对人的本性和行为规律的了解，去理解和检验那些理论，看哪些理论我们认为是对的，哪些理论我们认为不太合适，需要修正或推到重来。这样我们的研究才可能深入，你才可能对社会中一些大的问题有准确一些的解释。这是我讲的第二点。

¹ 吴文藻，《边政发凡》，载《边政公论》1942 年第 1 期。

四、 创建中国学派

1. 国际民族学社会学界分为两大体系

从世界观、阶级立场和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国际民族学社会学界历来划分为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社会学和西方传统民族学社会学两大体系。自民族学产生的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传统的体系一直在国际上占据主流的地位。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意义的民族学社会学都是 19 世纪中叶，在同一个时代产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曾大量引用当时民族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来支撑他们的理论。¹ 同时，他们也发表了多部民族学社会学著作，对人类社会和历史发展规律有完全不同于以往的阐释，从而开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社会学。²

马克思主义诞生的一个半世纪以来，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对其持敌对态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也一直受到西方主流民族学界或明或暗的排斥，并没有得到系统的发展，至今在理论体系的建设和研究成果上仍然是比较薄弱的。

二战以前，苏联学界将俄罗斯传统民族学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相结合，形成了民族学的苏维埃学派，直至苏联解体之前，苏维埃学派曾长期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学的主流学派。二战以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使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深入人心。西方民族学界一些进步学者开始应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论述民族学问题，从而产生了多种新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思潮，但其在国际民族学界仍处于边缘的位置，至今如此。

一个半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与西方主流的民族学之间既有紧密联系，又有尖锐的冲突。在对人类社会中观和微观层面上的观察和研究的方法、资料的利用等方面有较多的互相借鉴与重合，但由于在政治立场、世界观等方面的截然不同，在对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宏观解释上，双方一直有鲜明的对立和斗争。

2. 1949 年以前，中国主流的民族学社会学界属于西方体系

从 19 世纪末至 1920 年前后，是民族学被初步介绍移植到中国的时期。这个时期，从西方传来了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当时，在中国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中，是全盘照搬了西方传统的民族学人类学的学科体系和理论，也即非马克思主义的学科体系。

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抗日战争爆发后，严重的民族和边疆危机，促成中国民族学界将学自西方的学科理论与方法更紧密深入地应用于中国社会的调查与研究，经过多年本土化的实践，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中国民族学界初步形成了重视应用、重视历史文献、重视边疆和少数民族研究的特点，特别突出的是重视应用研究，即问题导向的研究，而且在这种研究中，民族学与社会学不分家。这些特点在中国民族学界传承至今。特别是在教学与研究中，将民族学与社会学的理论方法相结合，提倡实证性的社区研究是中国学界一个突出的传统。尽管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但从世界观上看，民族学界多数学者未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从立场上看，多数学者在研究中持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立场，对社会研究的态度是避重就轻，主张改良而非革命。³因此，这些研究仍基本属于西方传统的民族学体系。

¹ 如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亨利·萨姆纳·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约·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等。

² 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等著作。

³ 参见 1949 年 6 月 16 日在燕京大学燕南园有费孝通、林耀华、雷洁琼、李有义、吴景超等人参加的座谈会纪要。纪要原件手稿藏于中央民族大学闻宥先生家中。

3. 为什么要创建中国学派

民族学传进中国以后的近百年来，西方学界仍在不断发展，而我们却一直亦步亦趋地跟在他们后边。在我们的课堂上，在我们的教科书中所讲的理论和方法仍是几乎全盘来自西方。

我们感谢一百多年来西方学界给予我们的启发，我们今后还会不断借鉴学习国外学界的研究成果，但我们不能永远鹦鹉学舌，永远只作学生。

我们为什么要创建中国学派呢？仅仅是想标新立异吗？主要是为了争口气吗？是不是虚荣心和民族主义作祟？如果都不是，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总是跟在西方学界之后呢？我们该如何看待和评价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呢？

民族学、人类学创建一个半世纪以来，他的研究成果使我们大大加深了对人类自身的认识。它帮助我们能够比较科学理智地看待和解释各种人类社会和形形色色的文化现象，使得不同文化和社会的人能够互相宽容和理解。创建自西方的民族学人类学对人类是有贡献的，但这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西方主流的民族学也有其局限性甚至负面性的一面。

其一，西方民族学起源于殖民扩张，本是殖民主义的工具；至今部分西方学者在研究目的、理论和方法方面仍有殖民主义思想的残余；其二，西方民族学的理论范式并不是普世的真理，未必能够准确地解释东方的和中国的社会；其三，二战以后，原来为殖民主义服务的西方民族学人类学已经大大改变（例如研究现代社会和本土人类学思潮兴起），但总体上看，它从整体上肯定西方现有的社会制度和观念，仅主张改良，不主张革命。因此它的研究所产生的理论和观念仍然是西方价值理念的基础之一，是西方在全世界的文化强势地位的基础之一。

社会科学任何学科的思潮、理论都有其产生的社会背景。二战结束后，西方民族学的研究逐渐转向现代社会和本土，但这些研究仍是为西方的国际战略和国家利益服务的。在西方相对于广大东方和第三世界的世界性文化优势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也可以说，这个学科也是西方的世界性文化霸权的学科基础之一。

在国际社会，西方在舆论、文化、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等观念范畴的强势地位一直得以维持，这种强势地位是由西方的哲学支持的。民族学在西方主流价值体系之内，从来不是一个超脱客观、中性的学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还有必要与西方学界一个口径，一同起舞，全盘照搬西方的学科理论呢？

什么时候中国学界能否通过自己深厚的理论研究，梳理和提炼出我们的价值理念，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我们的研究方法，并以中国学派的名义在国际学界竖起自己的旗帜？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虚荣心和民族主义作祟，而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提高中国理念的国际话语权的需要，是我们的责任。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学界一直提倡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特别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上，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中国本土特色，建设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尽管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国特色的民族学人类学学派尚未形成。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仍然是以西方学界的理论方法为主要依托的学科。因而，中国学派的建立任重道远，是我们的历史使命，也是我们的机会和光荣。

4. 创建中国学派的时机

自马林诺夫斯基以后，我们在多数的学科史中都将人类学、民族学称为一种现代的社会科学，我们认为这个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地调查的方法）以及一个半世纪以来学者们归纳出的各种理论已经建立起了一门科学，它可以描述出各种不同人群的社会、文化的真实特点，并且能够利用自己的理论对这些特点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给予解释。我们踌躇满志地认为自己的研究能够为人们带来一种理性的、客观的、科学的认识。可是，后现代思潮的出现，特别是后现代民族学、反思民族学对民族学传统理论和方法的批判，已经逐渐打破了传统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光环，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局限性和明显的缺陷。民族学传统研究方法可信吗？他真的能够还原并揭露事

实的真相吗？

上世纪 60-80 年代，后现代思潮曾被认为是一种离经叛道的思想，但现在它已经成了全球的一种流行思潮。为什么呢？因为它对现代社会科学的很多批判确实是击中了要害。他们举出大量事实，对民族学家所撰写的民族志的真实性和客观性提出质疑。例如：有些民族学家的政治的或其他角度的观点对其民族志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妨碍；民族志中过多的修辞破坏了真实性；民族志往往是学者的一言堂；对异民族语言的不够充分理解，限制了民族志的可靠性；对事件背景的难以充分了解从而导致对人物和社会事实的曲解等。因此，传统的民族志调查和研究存在着很多非科学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被调查者的真实情况，而是民族学家的主观臆断，主观创造。过去学者们通过实地调查的实例，论证成功的很多理论，被证明是过度解释，是“削足适履”的结果。

后现代主义民族学的思想是在 90 年代以后才对中国民族学界产生实质的影响。当时正是这一思潮在西方得到急剧传播扩散的时期，并曾一度造成民族学认识论虚无主义的流行，嘲讽实地调查，使一部分学者堕入空谈。所以，当时我国少数学者由于未能全面理解反思民族学、后现代民族学的本意，未能接受其积极的一面，仅接受了其负面的、消极一面的影响，轻易地放弃了实地调查的实践和认识论，也堕入从理论到理论的研究。从事这样的研究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好的教书匠，在课堂上介绍西方的学科理论，但却脱离实际和社会，就像仅在书本上推导而脱离实验的物理学、化学研究一样，永远也不可能成为有创建的学者。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这样的人现在多已年近花甲，近年来虽然已经醒悟，但再改弦更张去做实地的调查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他们的教训是年轻学人的前车之鉴。

面对后现代的批判，民族学界应该如何去改进我们的研究方法呢？很多学者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其中，最著名也是最有成就者当属格尔茨。¹他再次为过去很多学者曾反复强调的“深描”定义，认为过去所谓“深描”其实都还是“浅描”。如何深描呢？虽然他提出了一些办法，也做了一些探索和示范，但实际上并没有给出一个真正可行的办法，于是有人批评他的示范也是在“过度诠释”。²

民族学研究方法的出路在哪里呢？这是国际民族学界都在思考探索的问题。后现代思潮对传统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有力批判，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西方传统的民族学理论方法之局限，继续步西方后尘的道路已经走不通了。在国际民族学界普遍开展的反思中，对我们来说这显然是一个时机，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中国实际，探讨中国经验，总结中国学界的研究，创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派的时机和时代已经到了。

¹ 石奕龙，“克利福德·格尔茨和他的解释人类学”，《世界民族》1996(3)；王铭铭，“格尔茨的解释人类学”，《教学与研究》1999(4)。

² 裴玉成，“解释的可能：读格尔兹的深描观点”，《西北民族研究》2007(1)；徐榕，“解释人类学述评”，《百色学院学报》2007(4)。

【论 文】

试议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内涵

菅志翔 何俊芳¹

摘要：本文从我国学界关于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归属问题的已有讨论入手，分析了民族社会学学科定位成为问题的原因，检讨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定位和内涵，以及当前应当具有的学术担当。文章认为，目前我国主流社会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民族问题，学者应当在调整和改善我国民族/族群关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民族社会学特殊的学科位置决定其学术担当：从社会学的民族/族群研究角度来看，这个学科应当在问题意识以及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在少数民族社会中的适用性方面为社会学界提供线索和思路；从广义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学科的贡献在于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在民族/族群研究中的应用。“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对民族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任务，民族社会学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关键词：民族社会学 学科定位 学科特点 学术担当

一、引言：何为民族社会学？

何谓民族社会学？我国对这一问题的探讨真正开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

自民族社会学作为一门分支学科被提出以来，国内学者们对“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定位或专业领域应如何界定一直很难达成充分的共识。根据刘敏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到目前为止，学者们提出的有关“民族社会学”的各种界定有二十余种²。王康主编的《社会学词典》中提出：“民族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它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研究各种民族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它又是一门边缘学科，它将民族学研究同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民族学的角度对各民族的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一门既有别于民族学，又不同于一般社会学的独立学科。”³这个观点虽然承认“民族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却强调“从民族学或人类学的角度”开展研究，似乎“民族社会学”虽然挂在社会学的名下，但是这个学科的研究角度（视角、方法）仍是民族学，换言之，骨子里是民族学（或人类学），名义上挂个社会学。这个定义反映出来的是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社会学恢复不久、民族学在重新建构，许多学科的整体结构尚未定型，各分支学科尚未发展起来，导致学科之间边界模糊的历史状况。

另外一些学者把民族社会学主要看作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郑杭生认为，“民族社会学是研究多民族社会良性运行和民族与社会协调发展机制的社会科学。具体来说，民族社会学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视野来探讨与民族相关联的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同时也从民族的角度来理解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⁴马戎认为，“当今人类社会种族、族群关系发展的客观形势也必然使得社会学家们对于种族和族群问题的研究越来越重视，并使之逐渐发展成为社会学的一个核心研究领域。……（目前）习惯地称呼我国的各少数民族为‘少数民族’，……沿用国内这个习惯用法，

¹ 作者：菅志翔，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何俊芳，中央民族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² 刘敏：《论民族社会学》，赵利生、刘敏 江波编：《民族与社会之间——中国民族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291-297。

³ 王康：《社会学词典》，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9 页。

⁴ 郑杭生主编：《民族社会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第 1 页。

种族与族群社会学 (sociology of race and ethnicity) 在我国也可以被称为“民族社会学”¹。“民族社会学”(族群社会学), 是“主要运用社会学(也借鉴其他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来分析、研究当代的族群现象和族群关系”²。

也有学者如贾春增把民族社会学放在民族学的范畴之内, 认为“民族社会学是广义民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民族学和社会学的一门交叉学科。具体地讲, 民族社会学是……运用民族学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学的一般方法, 对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变迁、民族文化和民族关系、特别是民族地区当前社会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和比较研究的一门学科”³。似乎民族社会学的基础理论来自于民族学, 而研究方法则取自社会学。

从以上我国学术界对“民族社会学”的各种界定的介绍中, 我们发现主要有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于认为民族社会学是一门民族学与社会学的交叉学科, 这种认识的基础是我国民族研究学科划分的特定历史和知识面貌, 另一种倾向认为民族社会学是社会学的族群现象研究, 是社会学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强调其学科基础, 并且以对民族/族群概念的社会科学考察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本文无意再提出一种新的有关民族社会学的定义, 而是想就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内涵以及我国民族社会学的发展问题进行探讨, 以求教于同行。

二、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归属缘何成为问题

社会学这个学科在 1952 年我国的大学“院系调整”过程中被正式取消, 直至 70 年代末才重新恢复。在中国大陆重建社会学这一学科的过程中, 许多社会学的传统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开始在我国大学和研究机构逐渐恢复设立, 如家庭社会学、法律社会学、政治社会学、经济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宗教社会学、教育社会学、人口社会学等等。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一些在西方社会学中兴起的新领域如社会分层与流动、医学社会学、科学社会学、环境社会学、知识社会学、艺术社会学、性别社会学、身体社会学等也被介绍进中国。从以上社会学诸分支学科和研究领域的名称上, 我们也可以看出, 社会学这个学科的研究对象极其广泛, 涵盖了人类社会的所有方面, 其中每一个方面都有潜力发展出一个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凡是采用社会学的视角和方法研究某一领域或某种类型社会现象的分支学科都冠以“××社会学”或“社会学的××研究”之名。但是, 与专注于研究这些方面的学科(如经济学、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宗教学、医学、环境科学等)不同, 社会学有自己认识社会的理论体系、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经典研究案例, 这些内容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学科传统与特色。由于研究对象与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许多学科的研究对象相同, 所以社会学的这些分支学科也不可避免与这些学科的知识体系交叉甚至部分重叠。而这种学科之间的交叉, 恰恰被沃勒斯坦认为是社会科学在 21 世纪发展的最大特点。

从字面含义上来分析, “民族社会学”是一个偏正词组, “民族”作为修饰词限定核心词“社会学”的内涵, 意指“民族社会学”是具有特定内涵的社会学, 是研究民族/族群现象的社会学, “民族社会学”属于“社会学”在概念的逻辑关系上是很清楚的。那么, 为什么民族社会学是社会学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是“社会学”与“民族学”的交叉学科却成为一个问题呢?

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中, 社会学(sociology)属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s), 民族学(ethnology)大致等同于人类学(anthropology), 属于人文学科(humanities)。而在我国, “民族学”存在广义民族学和狭义民族学之分。广义的“民族学”根据研究对象来确定学科的内涵, 将以中国的少

¹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 第 4-5 页。

²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导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第 3 页。

³ 贾春增主编:《民族社会学概论》,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第 27 页。

数民族为对象的学术活动统统囊括其中,涵盖了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甚至涵盖了环境、生态等自然科学领域,在学术的逻辑中理解,它与“民族研究”同义。狭义的“民族学”则与西方的人类学大致相当。如果我们按照广义民族学的内涵来考察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归属的话,正如研究我国少数民族社会中的政治现象的民族政治学、研究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活动的民族经济学都可以属于民族学一样,民族社会学当然也属于民族学。

我国当前学术体系中的学科设置,不管人们如何强调“本土化”,首先离不开它在本源上是从西方引进的与现代工业文明相联系的学科体系这个基本事实,因此在探讨学科定位时需要追溯其学术源头;其次,我国的学科设置既需要与当代国际学术界通用的学科体系接轨与对话,在学术话语进行互译时避免彼此产生歧义,也需要协调好各个学科之间的关系,以更有利于学科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当我们把社会学与广义的民族学放在一起讨论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归属问题时,这实际上不是一个学科归属问题,而是一个学科设置规范问题。从学科归属的角度讲民族社会学是社会学的分支学科,而从研究对象来讲,民族社会学做的就是民族研究,当然也可以讲它是广义的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关键问题是在设置学科时应当遵循的规范是什么。

三、民族社会学的学科内涵

民族社会学是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产生的一个专业知识门类。人类社会进入二十世纪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后,随着现代化、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传统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各族群之间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日趋紧密,在社会同质性不断增强的同时,各民族复兴自身传统文化、追求民族个性的努力也在增强;全球范围人口迁移的剧增和社会交往的加深,也使得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成为多民族或多族群国家。但与此同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伦理社会向法理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各民族/族群之间以及各民族/族群内部社会发展的不均衡性、非同步性日益突出,因民族和族群因素产生的社会矛盾和文化冲突、群体利益冲突也逐渐凸显。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为了正确认识和应对不断产生的与民族/族群群体和族属身份相关的各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群体权益问题,许多社会学家们开始把民族/族群关系研究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专业研究领域,也被人们称为“种族、族群研究”和“族群社会学”。

如果说民族社会学作为主要跨越在社会学和民族学之间的一门交叉学科,这是由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所决定的。“民族”(民族/族群)这种特定的研究对象要求研究者在其展开社会科学研究时,首先要进入各民族/族群社会内部,避免作为“他者”而对研究对象产生误解与隔膜,民族学或人类学可以系统地提供一套帮助研究者进入各种社会群体(包括民族/族群)的主位研究方法。而关注各民族/族群的社会学层面的问题以及群体之间的关系(如族群分层与社会流动,社会制度和政府政策对族群关系的影响,族际交往与族际通婚),决定了民族社会学所开展的是社会学研究。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学为民族社会学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而民族学(人类学)则是在方法论层次上对这种针对具有特殊性质的社会群体现象的科学研究进行学术反省和监控,避免研究者不自觉地站在主流群体的角度上片面地认识族际关系,从而保证民族社会学的知识生产经得起权力关系和学术伦理的检验。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里使用的“民族学”,其含义不同于前文所讨论的广义“民族学”¹,而是指以民族志为方法基础并在

¹ 在我国的“民族学”一级学科下,各民族院校设置的二级学科各有特色,不尽相同。设在“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政策”、“中国少数民族经济”、“中国少数民族史”、“中国少数民族艺术”、“民族地区公共行政管理”、“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中国少数民族史”、“民族政治学”、“民族法学”、“民族生态学”、“藏学”、“民族社会学”、“中国少数民族传统医学”等多个。一般来讲,在民族院校,在没有一级学科的情况下,相应学科的发展都采取先设立“民族学”下的二级学科,为相关学科的发展建立平台,孵化出新的一级学科的策略。如中央民族大学曾在民族学下设立民族社会学、民族政治学、民族经济学等二级学科,而目前都已经建立起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一级学科点。

比较民族志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基本上等同于人类学的狭义民族学（ethnology）。

如果要讨论民族社会学与当前我国学科建制中的“民族学”的主要区别，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差异在于对“民族”这一现象的认识上。我国多数民族学研究者倾向于把“民族”看作客观存在的、稳定的社会实体来研究，而民族社会学则关注“民族”构建与演变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既包括了祖先血缘、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生活习俗、传统经济活动类型等历史因素，也关注教育、就业、区域发展、人口流动等现实社会因素对各民族/族群的处境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影响，又关注政府的相关制度政策（如“民族识别”、区域自治、族群差异化政策等）对群体和个体成员认同意识的构建和对族际互动的作用。民族学偏重于研究作为社会实体的民族自身的历史、语言文化和习俗等，而民族社会学侧重于研究作为关系性现象的族群的各种结构性关联和社会表征问题，注重研究族群社会分层结构与流动模式，关注各领域（政治、经济、文化）中的族际互动模式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族际交往状况（社会网络、族群社区、语言相互学习、学校及就业单位族际互动、族际通婚等）和群体认同的变迁趋势等。

民族社会学的突出特点在于：它虽然以民族/族群为研究对象，关注这一类型的社会群体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地位、角色和及其社会运行过程中的各种现象，但由于民族/族群具有的特殊性质，相关研究涵盖了政治、经济、人口、阶级/阶层、性别、文化、语言、宗教、城市、农村等几乎所有的社会学其他重要分支的内容，涵盖面非常广泛。正因为如此，在研究方法上，民族社会学在应用社会学的基础研究视角的同时，还注重依据不同研究对象的实际选择多维度、综合性的研究框架和方法设计，尤其注重跨学科方法的应用。

总体而言，我们认为民族社会学的独特性主要在于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并借鉴人类学、经济学、人口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知识，将民族/族群现象和社会发展放在一个完整的社会体系中来认识，同时又从民族/族群的角度来理解它们的社会结构位置的形成为演变、分析群体之间的互动与社会关系运行的规律，在制度设计和政策制定、调整等方面为维护多民族/族群国家的社会稳定、族群良性互动及增强国家凝聚力提出对策性建议。

四、民族社会学的学科特点

作为社会学的一门分支学科，在与社会学其他分支学科的比较中，民族社会学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是研究内容上的广泛性。这种广泛性既是相对于社会学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农村社会学、城市社会学、家庭社会学等而言的，也是相对于与民族研究相关的其他学科如民族政治学、民族语言学等学科而言的。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内容“广泛地涉及表现在民族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过程，以及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等方面以不同方式发生的互动和联系。”¹

民族社会学的研究内容既有在宏观层面上的整体性研究专题（如社会体制、人口结构、政治制度中的族群相对地位与角色），也有中观层面（如区域性族群社区研究和群体互动模式）和微观层面（如家庭或个体的群体认同意识的产生与演变、个体成员之间的互动模式等）的研究专题，具体内容涉及政治（民族自决权、民族自治等问题）、经济（族群分层和社会流动模式）、人口（人口结构差异）、心理（群体认同和民族/族群意识）、社会问题（群体权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等方面，凡是与民族/族群因素相关的社会问题均可纳入其研究领域。当然民族社会学研究的重点还是围绕着民族/族群关系展开的，而且具体研究内容的侧重点也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

¹ 刘敏：《论民族社会学》，赵利生、刘敏 江波编：《民族与社会之间——中国民族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299。

而不断调整。

二是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的综合性。在很大程度上，民族社会学研究内容上的跨学科性和广泛性决定了其研究视角及研究方法上的多样性和综合性。民族社会学研究者在涉及到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领域时，需要掌握与这一领域密切相关的专业知识（基础理论、研究方法、指标体系、经典案例等）。例如，研究族群人口结构变迁时，研究者需要系统掌握人口学的基础知识、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在研究少数民族习惯法的实际应用情况及其与国家法律之间的互动时，研究者需要了解国家法律体系与运作规则，同时熟悉地方性习惯法的道德惯性和民众接受程度。在研究少数民族教育时，研究者需要熟悉教育学，系统了解国家整体的教育体系运作、双语教育的普遍规律、教师队伍与教材编写情况，并与毕业生就业调查联系起来。因此，民族社会学研究工作要求研究者具有广博的跨学科跨专业的知识储备和调查研究经验，熟悉包括历史文献、调查案例、统计数据等各类信息资料的处理和研究方法。

许多人认为民族社会学是跨越社会学和民族学/人类学的交叉学科。在与我国传统的民族学/人类学的比较中，民族社会学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第一、在对一个国家内部少数民族/族群发展和族际关系的研究中，社会学综合性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在关注各民族/族群存在的差异性（族源、语言、宗教、文化习俗、社会组织、经济活动类型等）的同时也非常关注各民族/族群之间的互动、各民族/族群组成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个政治实体的一体性，这个一体性也可以称为“（多）民族共同体”，这在中国的场景下又被费孝通称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在社会学的族际关系研究中，既关注“多元”和差异性，同样关注“一体”和各民族/族群之间的共同性、包容性和统一性。

第二、民族社会学对任何国家开展族群研究的起点，是多族群国家的政府和主流社会对本国族群关系的整体框架和发展目标。有的国家采用联邦制，有的国家是保留地制度，有的国家是区域自治，这些不同的国家体制是在各国进行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历史条件、内外力量博弈和主流政治力量的政治理念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演变的。社会学家通过实证调查分析这些制度与政策设计的目的与初衷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异同，分析造成差距的各种原因，考察在这些政治实践过程中各群体的演变以及民族/族群关系的变化。

第三、社会学家在社会调查中不仅关注各族群社区自身的变化，同时关注多族群混居社区中的族群互动模式及关系的演变，关注在城镇化和人口迁移过程中不同族群成员相遇、混居和互动过程中各自的认同意识和文化观念的变化，特别关注族群关系演变的历史过程和未来发展趋势，调查分析影响目前族际关系演变方向的各种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因素及现代传媒网络和外部势力的影响。

第四、在具体的研究操作方面，社会学十分注重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民族社会学在应用社会学通常采用的基础研究视角和调查方法的同时，还注重依据不同研究对象和具体专题的实际需要来选择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在运用中把这些方法综合起来。

五、我国民族社会学的现实关怀和学术担当

讨论学科的归属、内涵和特点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开展研究工作，但对于研究工作而言，更重要的是设立这样一个学科到底要做什么的问题。或者换一个角度提问题：既然民族社会学的具体问题、理论和方法可以与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学科交叉，专门设立一个民族社会学的必要性在哪里？

多民族/族群国家的民族/族群关系问题和现代国家的建构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各国的学术界都十分重视与之相关的理论和经验研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关系事关国家的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与全国其他地区和汉族一样

经历了巨大的变迁。但由于少数民族在社会结构、经济活动方式、历史文化背景、现代教育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各民族在这一巨大变迁中的处境、遭遇的困难各异，少数民族的文化雕饰和社会发展以及整个社会的族群关系转型正经历严峻的考验，需要我国学术界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以便为个体、为政府及各种社会组织判断形势和社会问题、适应社会变迁、积极采取行动提供必要的知识、思路和对策。

社会学者既关注人，也关注社会，专门研究人生存于其间的社会结构和由人们的行动构成的社会过程。社会学的特点在于整体地把握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贯穿从微观到宏观社会现象，既可以描述和说明制度与文化，又能够理解和阐释人的意图和判断。在社会分工日益发达、功能分化日益精细的当代中国社会，社会学对于人们的社会认识和反思的重要性日益突出，社会学的民族/族群研究的不可或缺性也日益显现。因为，只有社会学可以胜任在关注作为人的少数民族个体的社会生存状态的同时，也能够关注赋予人们以归属感和意义的文化的状况、关注为个人和群体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空间的整个社会的宽容、和谐和整合状况。这是中国民族社会学的现实关怀。

目前，中国的民族问题研究主要是由民族学界的学者开展和推动，中国社会学界对这门学科的关注程度虽在不断增强，但关注度还明显不够。如在我国学者编写的社会学概论、社会学教程等基础教材中，鲜有在其内容中涉及民族（族群）问题的；在非民族地区的院校中把“民族社会学”作为一门本科生课程开设的情况也十分少见；在社会学界召开的社会学学术会议中，一般均不把民族（族群）问题作为讨论的议题；在社会学界主办的《社会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中，极少刊载与民族、族群问题相关的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社会学年鉴》中也没有把“民族社会学”或“民族/族群研究”列入专题目录，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的与民族问题相关的学术论文中，具有社会学学科背景作者的比例也很低。这与我国一些地区民族关系的严峻形势、民族问题在我国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中占有的重要地位是非常不相称的。

我国社会学界的这一现状与美国、俄罗斯等国家社会学界对这一领域的高度重视形成了鲜明对比。如以美国为例，由于黑人等少数族裔问题是美国社会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所以美国社会学中规模最大的分支组织即是“种族与族群研究”，在每年举行的美国社会学年会中，至少要安排一个分会场来讨论“种族与少数族群研究”这一专题；最著名综合大学的社会学系都设有“族群社会学”、“族群研究”这一专业方向并开设有相关课程，研究生可以选择这个专业方向作为自己学位的主修或副修。西方国家出版的所有社会学概论教材中都有论述“种族与族群”的章节，如欧洲流行的由吉登斯主编的《社会学》（李康译，北大出版社 2009 年）中，第十三章为“种族、族群性与迁移”，第二十章第五节为“有关民族主义与民族的理论”；由戴维·波普诺所著《社会学》（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第十一章为“民族（ethnic group）、种族与少数民族；美国由 Linda L. Lindsey 和 Stephen Beach 编著的《Sociology》（社会学）第五版（Prentice Hall 出版社 2004 年）的第 12 章是“Racial and Ethnic Minorities”。与社会学相关的几种核心学术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Social Forces*, *Social Problems* 等）每年也都发表相当数量与种族、族群相关的文章¹。这一方面反映出美国和西方各国的种族、族群与外来移民造成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问题十分突出，得到主流社会和各大学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西方各国社会学界专业体系的发展比较成熟，族群社会学这一专业方向具有相当规模的研究队伍和学术成果积累。

在我国虽有很多从事民族问题研究的学者，但绝大多数的学术背景是民族学或者人类学，在理论基础和分析视角、选题思路等方面与受到社会学专业训练的学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异。目前，我国主流社会和政府部门高度关注民族问题，中国社会学者应当在调整和改善我国民族/族群关

¹ 马戎编著：《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第 5 页。

系方面发挥更大作用，这无疑将提高社会学在中国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并使社会科学家在促进国家构建和各民族共同繁荣方面做出重要贡献。民族社会学正是我国社会学与广义的民族学之间的桥梁，特殊的学科位置决定了民族社会学的学术担当。从社会学的民族/族群研究角度来看，这个学科应当在问题意识以及社会学研究方法和理论在少数民族社会中的适用性方面为社会学界提供线索和思路；从广义民族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学科的贡献就在于规范的社会科学方法在民族/族群研究中的应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最近召开的新疆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这就对民族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和任务，民族社会学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民族社会学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已经在我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理论探讨、经验研究、教材编写、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也在基础理论和实证分析方面为中央和各级政府制定民族政策和民族地区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中国的民族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还存在诸如基础理论薄弱、学术研究的规范化程度较差、专业研究人员缺乏、社会影响和学术交流薄弱等各方面问题¹。作为一门新兴分支学科，民族社会学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还需要一个过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目的在于从实求知，敢于创新，服务社会。国家和社会的知识需求和现实需要要求我们承担起进一步深入研究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社会的重任，这也为民族社会学这个特定学科和专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论 文】

社会科学中的文化自主性问题²

渠敬东³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繁荣景象，队伍越来越壮大，研究成果也越来越规范化，一度竟有压倒人文学科研究的态势，没过几年就确立了自己的话语优势地位，以至于文史哲的学术研究，似乎必得借助国际上最通行的社会科学概念范畴和话语体系，才不致落后挨打，使自己边缘化。这里，暂且不说人文学科现状，中国社会科学十几年的复兴和繁荣，反映出了一些最基本的特点，而且，其内部在研究风格、立场和取向上，也越来越呈现出巨大的张力。大体说来，目前中国社会科学总体上表现出来的三个基本倾向很值得关注，尤其与我们所讨论的“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密切相关。

首先，配合“与国际接轨”的浪潮，社会科学不仅在教育和研究上继续贯彻制度移植的方针，在理论和方法上也继续追踪西方最新研究成果，积极主动地坚持思维移植的路线，继续扩大自己的战果。而且与诸人文学科相比，社会科学这方面的特点更为明显，越是最新的理论和方法，就越有学术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从大量的学生学位论文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这种西方话语体系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趋向。其次，近年来，与上述思潮相应也在学术界涌出了一股逆潮，即一种号召从本土经验出发进而宣扬本土学术意识的思潮。甚至出现了这样一种很有意思的现

¹ 赵利生、刘敏、江波主编的《民族与社会之间——中国民族社会学基本理论研究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0 年，第 16-17 页。

² 本文刊发于《开放时代》2006 年第 1 期。

³ 作者为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教授。

象，移植派的步伐越坚定，本土派的呼声则越强烈。本土派的立场非常明确，即无论从中国社会的传统来看，还是从近三十年的社会转型和变迁过程来看，中国经验是独一无二的，不能用西方学术的理论和方法来度量，单纯用西方学术的眼镜来考察中国现实经验，不仅看不清，还会走了神，不仅会妨碍我们触摸中国社会的具体现实，甚至会遮蔽这种现实，造成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普遍的精神无能状态，恰如韦伯所说的“无生育能力的亢奋”那样。在这些学者中，有的主张我们应该不带理论所形成的既有观念直接进入田野，直接记录中国社会最本真发生的一切现实状况，深入挖掘中国社会所独有的本土学术资源；有的则主张应该建立一套与西方社会理论完全不同的概念体系，如“人情”、“面子”这样的概念，进而彻底颠覆西方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术殖民。

当然，除了上述两种倾向外，社会科学界近来更明显地反映出了一种带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意味的学术倾向。奇怪的是，这种倾向夹杂着“左”“右”两方面的思想资源，并存在于“移植派”和“本土派”的两种思潮之中。这种倾向的一个基本立场，就是从“弱势群体”出发，借用权利话语主张社会公正。其基本的理论基础，是“国家与社会的对张关系”，即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两者完全不同的形态，具有两种不同的运行逻辑，因此，社会科学家应该持有一种明确的学术道德立场，即从社会的逻辑出发，确立社会自身的独特价值，为弱势群体的利益辩护。不过，值得讨论的是，上述这种倾向若单纯建立在道德关怀和责任的基础上，不免会给学术研究本身带来危险，毕竟“课堂不是鼓动家的舞台”，科学不能为单一价值所引导；倘若从学理的角度看，这样一种与国家对峙的社会原则也多有想象的成分在里面，无论从西方的现代化过程，还是从中国现实发生的社会转型及其历史基础来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没有这样简单。

面对这样三种基本倾向，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所要讨论的主题：究竟什么是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首先，我认为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之所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并不与中国近来国力增强的现实有直接的逻辑关系。我想，对任何一个对世界文明有所承担的文明体系来说，文化自主性是这个文明或民族至始至终面对的问题，若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清末民国的许多学者比我们今天认识得更清楚，这个问题的迫切性不在于今天我们国家的经济有实力了，而在于我们忘记了我们必须有的这个承担。中国文明及其所依赖的社会基础对整个世界现代文明的意义，我想不是文化相对主义者所说的那样，仅仅是一种文化多元共存的意义，中国文明不是马来文明、新加坡文明，她的价值也不是世界上那个小国家的文明所能等同的。对目前以西方文明为主导的现代世界体系来说，中国文明是少数几个能够孕育和构成其未来可能性的文明体系之一，说得悲观一些，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文明体系。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没有这个前提，就没有这里所谓的文化自主性。我们前人已经做过相当的努力，我们必须接续这个传统继续努力。文化自主意味着，在整个世界未来的文明格局中，我们不是尾随者！

不过，如果把我们的话题再缩小些，问题就不这样简单了。说到“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问题就会变得复杂许多。我个人认为，就目前中国学术研究的现状而言，所谓“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实有双重涵义：即“学术自主”和“文化自觉”。学术自主应为文化自觉的基本前提，但学术自主必以文化自觉为指针。学术自主意味着我们首先必须确立学术自身的原则和标准，科学研究必须有其自身的指涉，必须首先辩明其与政治立场和道德关怀之间的关系；换言之，学术本身并非直接是由其他价值原则来统摄的，学术必须继续通过适当的制度配置和规范尺度确立其自身的独立性，中国学术的这条路依然很长，我们得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不过，倘若只有这样的标准或尺度，没有更高的价值考量，特别是在西方学术话语体系的强势压力下，我们的学术会陷入因无视自身而茫然无措的境地，只顾去清扫西方理论的边边角角，而对中国社会随处隐藏或浮现出来的大问题漠然视之，使我们对这些问题本身的总体性反思变得等而下之，从而遗失掉这些问题本身所蕴涵的检讨整体文明的意义；若是这样，无论我们有怎样的文明承担的意愿，也只是

枉然，未来我们将会越来越失去属于我们自身生活的幸福的可能性。可是，倘若我们只有文化上的自觉，而无自主的学术，那么由此唤起的民族热情和文化亢奋也将是没有生育能力的。单纯的热情和亢奋换不来清明的头脑，由此而来的文化，也必然是低等的文化，何来文明承担！

说到这里，我们就会认识到，若实现这样的学术意义上的文化自主，就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就外部条件来说，我们这些学者必须具备进行自主学术研究的制度保障和保护；就内在条件来说，我们必须具备基于中国经验本身的扎实而敏锐的问题能力。前一个条件用不着多说，大家都清楚，后一个条件却值得好好说说。

若从学科的角度看，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处境本来就很尴尬。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社会科学从无到有，其基本的学科分类体系、概念体系和论述方式都是沿用西方既有的设置来安排的，所以，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总是处在一种实质意义上的两难处境之中，那些表面看来最符合西方学科理路的中国经验研究虽然论证形式规整，但总有言尽意难尽的隔靴搔痒之感，而那些用力图尽量采用本土话语来阐发本土问题的学者，却总是憋一肚子话道不出来，总会流露出辞不达意的学术失语感。我想，这恐怕就是上文所说的移植派和本土派分别面临学术困境的根源。不过，我个人也觉得，中国社会科学表现出来的这种局促性，也未见得全是坏事，我们至少可以说，这种焦虑本身恰恰可以证明我们的学术依然具有自身生命的特质。人有焦虑，可以证明他还活着，学术有焦虑，恰恰可以证明他还有许多生命中未解的难题需要去琢磨和解决。所以，我很想说，中国社会科学自发形成的自主性从来就没有泯灭过，只要严复有焦虑，王国维有焦虑，梁漱溟有焦虑，我们今天的学者有焦虑，这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潜藏着的希望所在。

当然，在学术研究上从自发到自觉，需要有个总体的认识过程。但我们必须首先意识到这种自发性的根源。我认为，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的自发性，直接来源于中国文明及其社会形态本身所具有的总体特质。对于一个有一定学术操守的学者来说，即便他带着一整套西方的学术概念，只要他深入到中国最具体的社会经验现实中去，他就会即刻感觉到研究的焦虑，他一定不会认为，他所面对的所有缠杂交错的各种现象可以用现手的概念工具迎刃而解。在具体的经验研究中，我们随处会遇到说不清、道不明的难题，学术上的失语，首先是因为丰富的现实经验本身使然，这恰恰说明，所有这些经验现象每时每刻都藏着突破既有概念体系的契机。其次，这种焦虑的产生，与这个文明在我们身上孕育的属于我们自己的经验感受力有关，对于学者来说，文明给他自身的文化蕴涵和积淀，以及由此形成的认知上的知觉和视界更为重要，所有认识社会的过程必须先以对自身的感知和认识为前提。在这个意义上，特别是就我们自身的生命感知来说，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有自己对生活的“好”、“乐”、“幸福”的经验感受，这是所谓文化自觉的最根本的基础。文化自觉源于我们对自身生命和生活的最根本的尊重和自信。

学术研究在文化上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首先基于对自身的信念和认识，而且，这种信念必须建立在对自身文明形态的总体认识的基础上。但对于社会科学来说，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中国当下的社会形态与其传统的文明形态并不呈现为直接对应的关系。这是因为，构成我们当下社会形态的，既有传统文明的根源，也有西方的现代因素在我们物质和精神生活中的强入和渐入过程，更有几十年来共产主义文明凝结在我们身心中的制度结构和心理结构。因此，谈到对我们自身的认识，中国的社会科学应该有其自身更丰富的经验感受和更独特的总体视角。在这个意义上，移植派和本土派虽各自有其反思中国经验的出发点和合理性，但若仅仅依此单向的视角来看待如此复杂的经验现实，就不免显得有些一厢情愿了。移植派的研究不免会流露出过于制度化的倾向，本土派则免不了会寄托于过于宽泛的文化基础，当然，中国目前的人文研究也多少暴露出了后一种流弊。当然，这一讨论也与中西概念究竟哪个适用于研究中国现实经验的问题有关。坦率地说，这个问题不是个真问题，至少可以说不太朴实。今天，中国社会的现实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甚至我们的身心是由什么来构造的呢？简单地说，“古今中西”。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简直有

着这个世界最复杂的结构。所以，无论中西，无论古今，都有用来分析我们社会的适用的概念。比如，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工厂，光农民工就有一亿两千万的人口，正在形成一个广泛的阶级群体，阶级这个比较西方的概念就很适用来研究中国社会；再比如，在我们今天的社会学分析里，很少见到“礼”这个中国传统上最核心的概念，对这个概念弃之不用，我个人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研究中很大的悲哀，“礼”在中国社会现实运作中起的重要作用，往往会因为不使用这样的概念工具来分析，所以得不到确当的把握。李安宅先生解放前早就做过《〈仪礼〉和〈礼记〉的社会学研究》，今天的社会学家却忘得一干二净了。

更重要的是，在最具体的经验研究中，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们越来越感受到，任何一个看起来狭小局部的社会问题，似乎都纠缠着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倘若严格依照西式的学科分类体系都不能够加以充分全面的把握。单纯的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视角，即便触及到中国社会变迁中的一个微小问题，都似乎显得很局促，不那么自足。一方面，这可以说我们目前学科的专业化能力不够，但另一方面，恰恰说明这样的专业化能力在应对中国现实问题时其本身就是不充分的，不自足的。大家都能明确意识到，百年来中国始终处于一个大转变（great transformation）的过程之中，这种总体性变迁中发生的任何一个微小问题，都是总体性的大问题，我们必须时刻提醒自己，我们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具有原生性的理论意义，这是处于这个时代的中国文明为我们提供的思想宝库；何一个问题，都不能借用已经全面结构化西方社会所形成的学科体系来处理，在他们那里也许是个局部问题，到我们这里就要复杂得多，这些问题都是用西方既定的学科化的小理论处理不了的。正因为发生在大转变时代里的小问题都是总体问题，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一个总体文明的角度来考察一切问题，这才是我们今天谈我们的文化自觉的根本要义。因此，我们必须得从中西两个方向上回到思想家们曾经面对过的那个总体性时代，正如孟德斯鸠所说的，我们必须以检讨我们的国家总精神和文化总精神为起点，才能担负起这个大转变时代交给我们的学术使命。

今天我们来讨论中国学术的文化自主性，意义重大而深远，这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资格做这样的承担，而是因为我们忘记了这种承担而越来越失去了我们的资格。这个问题对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来说显得尤为严肃，因为我们受到的学术挤压越来越强烈，而我们遇到的现实困惑也越来越强烈。更重要的是，由于既有的学术传统割断了很长时间，我们并没有扎实的文化培育基础和深刻的文化反思能力来应对这些挤压和困惑。中国的社会科学在人心与政治两端都缺少充分的思想营养，倘若分析社会现实没有人心的照看，批判社会现实没有政治的远见，倘若社会科学没有心性之学滋养，没有政治之学提升，社会科学家们不从照看自己出发来关怀社会，不从照看国家出发来理解社会，那么这里所说的社会也只能永远是一个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婴孩，决不会在世界文明中占有一席之地，更不用奢谈去承担世界文明的未来可能了。几十年前，梁漱溟、吴文藻、瞿同祖、费孝通等老辈社会科学家们都有这样明确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文明的意识，他们都把中西古今的思想资源、人心政治的思想资源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发轫的根基和命脉，今天的社会科学家们不知会有怎样的感怀！

在这个大转变的时代里，中国问题就是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就是世界文明问题。我以为，若要发现这些问题，发现这些问题的根本要义和价值，中国的社会科学就必须在三个方面下苦功夫：

1. 全面培育自身对中国社会经验现实的经验感受力，消除学科之间的界限和芥蒂，触类旁通，兼收并蓄，融会贯通。这里没有捷径可走，把人家现成的理论框架拿来直接度量中国现实是行不通的，以为我们只要赤脚走进田野就能判识中国现实的真相也只是想象，没有丰厚的人心凝练，没有深刻的政治洞见，我们的学问就只能是小圈子里的学问，落入末流之学。

2. 必须对西方学科分化的学理根源和历史脉络加以深刻检讨。这要求我们既要追溯到西学之根本，又要对西方现行的学术制度体系有通盘的认识，既要去检讨西方思想史中总体性的核心

问题，又要严格既有的专业化科学方向作出自己扎实的学术研究，以总体问题的角度带动专业研究，再以专业研究的理论突破彰显总体问题的文明意涵，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根本进路。

3. 从大学教育入手，在社会科学的专门化教育中植入人文教育的要素，并将与中国经验现实有关的理论和实践课程制度化，尽快制定专门研讨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学术传统的课程计划。所有这些都旨在建立人心与社会、文明传统与社会现实的思想纽带，用文明总精神和国家总精神来统领社会科学研究的去向和命脉。

中国社会科学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明的自觉承担，是中国的文明传统和现实经验交给我们的命运和使命。一个人或一个文明，倘没有文化的自觉，就不会过上好生活。

【报刊文章】

康熙与教皇使者的一次交锋¹

张国刚（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康熙皇帝与路易十四、罗马教皇都有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他请路易十四多派传教士来华，请罗马教皇允许传教士遵照利玛窦规矩继续留在中国。

17世纪末叶，耶稣会内部正为中国礼仪之争，闹得不亦乐乎。核心内容是，中国教徒可以祭祖祀孔吗？康熙也被带进去了，为此还与罗马教皇及其使节有一次激烈的交锋。

徐日升、张诚、白晋等在华传耶稣会士，是曾经帮助大清朝与俄罗斯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功臣，也是康熙皇帝在天文、历法、数学等自然科学上的老师。他们焦心于罗马教皇对于其在华传教事业的干预，特请示康熙帝关于中国礼仪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请皇帝证明，中国人祭祖祀孔之礼仪，无关乎宗教信仰。康熙慨然应诺，特颁发谕旨，确认耶稣会士理解正确。此谕旨被翻译成拉丁文，送到梵蒂冈，教皇大怒：我们宗教事务，岂容一个异教君王判断！并派出特使铎罗到中国去检查教务。

铎罗1705年4月到达广州，同年12月14日抵达北京，12月31日首次觐见康熙皇帝。虽说是礼节性的，但双方为一些人事问题有不同意见。铎罗提出在北京设立总主管，管理全体教士。康熙当时没有答复，后来答复说，这位宗教事务主管，必须从在宫廷中服务了10年以上的传教士中选择。这不符合罗马教皇的意图，教皇之意要夺回在华传教的主导权。康熙提出在铎罗使团中选一人出使罗马，以报聘教宗。铎罗推荐的人选，康熙也已同意，后来发现此人不通中文，提出由宫廷耶稣会教士白晋为正使，铎罗推荐的人为副使。白晋曾撰写《康熙传》，深得皇帝信任。对此，铎罗很是不爽。由此可见，康熙意识到不通中文，不了解中国文化的传教士，很可能会坏了大清与西方关系。

半年多以后，即1706年6月29日，康熙第二次接见铎罗，对于铎罗的目的已经有所警惕。康熙很关切教皇对他那道谕旨有什么回应。铎罗支支吾吾，不愿意正面回答。康熙不得要领，邀铎罗次日游览畅春园。

次日，即6月30日，在畅春园会面。康熙开门见山警告特使，不要干涉中国人的习俗，天主

¹ 本文刊载于《南风窗》2016年1月27日-2月9日，第3期，第101页。

教须与儒学和谐共处，若反对祀孔祭祖，西洋人将很难再留居中国。铎罗无法回避，说天主教与儒学之间的冲突，他本人没有能力解释，福建宗座代牧阎焯，精通中国文献，可作详细解答。

阎焯是法国人，主持福建教务，不满葡萄牙耶稣会士在华垄断地位，此时奉铎罗之命早已来到北京，并被要求从儒家经典中摘录出，他认为与天主教相抵触的内容。阎焯硬着头皮从“四书”“五经”中摘录出一些章句，分列为48个命题，说儒家“太极”或者“理”不可能指天主教的神，中国皇帝祭祀天地、星辰、山岳等行为与天主教相抵触。

康熙特地在热河召见了阎焯。阎焯摘录的文字，错误百出，康熙断定，阎焯完全没有能力解释中国书籍。现在他要当面测试阎焯，看看他对“四书”的熟悉程度，并指着御座后的几个汉字，要阎焯识认。阎焯只会讲几句福建方言，既不能从“四书”中翻出皇帝要求的内容，几个汉字也只认得一个，见驾时全靠翻译。

这水平与康熙身边的传教士，差别太大了。康熙指斥阎焯“愚不识字，擅敢妄论中国之道”。说阎焯不谙中文，却把不伦不类的译作发往欧洲，导致教宗误解中国教义。阎焯辩称他的中文的确不够熟练，但儒家经典也的确有不符天主教之处，他挑出这些内容寄给教宗，是将疑难问题都提交教宗裁定。

阎焯这种冥顽态度，使皇帝不再有容忍之心，于是很快就下令驱逐他。皇帝同时通知留在北京的铎罗，他的国家里不需要任何唱反调的传教士。康熙命各地传教士进京接受审查，发誓永居中国，发誓遵从利玛窦规矩，即尊重中国文化和风俗，否则，请立即出境。

这次的事件后来愈演愈烈，到雍正、乾隆时期发展成为一场禁教活动。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康熙最后的处置，虽然有简单化之嫌，但维护中国传统的态度，亦无可厚非。罗马方面干预在华教务，夹杂着权力与利益考量，难辞其咎。设想当年佛教在中土的传播，如果“娘家人”也如此的颞颥干预，恐怕也会中途夭折的。

【报刊文章】

从难民村看在印藏民困境

《参考消息》2016年4月3日第8版

【本刊讯】在新德里北部亚穆纳河边上有一个名叫马吉努卡提拉的地方，1960年印度政府批准在此建立一个西藏人难民村，迄今为止已有56年历史。现在这里居住着大约1万名藏人。当地藏民主要靠买卖中国商品为生，生活十分困苦，而他们在得不到当地公民权的同时，还要经受“藏独”势力严密监视，不少人希望返回中国生活。

今年60岁的朗葛在这里生活了多年，经营一家卖食品香烟的小店铺，小商品大多来自中国。他老家在中国云南，最近他把店铺转让给了别人并打算回国。“在这里20多年，生活没有任何改变，也就是这家店铺可以卖点钱，我打算回老家做生意，”朗葛对记者说。

这里的经济社会状况日渐萧条，许多店铺关了门。像朗葛这样长期生活在印度但计划回家的藏人不在少数。他在这里算是中层藏人，不算贫困者，但即使这样也收入很少。而随着西方游客减少、治安日益恶化，他的店铺也难以维持。他一再提醒记者，小心小偷啊，当地人很坏啊。

在一家新开的服装和旅游鞋店里，店主对记者说，这里的衣服和鞋子全部来自中国，他与国内商家有定期供货关系，顾客主要是藏人。一名叫梅朵的商店经理说，她来自甘肃，因为有亲戚在印度，三年前来到这里，但这些亲戚多数十分贫穷，她从国内带了钱来做生意，想等以后赚了

钱就回国。

一位名叫米玛的女藏人两年前在村里开了一家韩国餐厅，同时经营一家小旅馆。她说，有了餐厅和旅馆她基本能够维持生活，但由于难民村地方偏僻，生意也只能勉强维持。原来有不少西方游客来这里游览，但随着印度治安不断恶化，来新德里旅游的西方人特别是女性游客越来越少，难民村也正失去旅游业这一经济支柱。

走进这个难民村，到处都是破旧不堪和弯曲狭小的道路，不免让人感到一种紧张气氛。难民村中心寺院广场是当地宗教活动的中心，每次经过那里，记者都会觉得背后有眼睛在监视着。那里也是“藏独”分子活动比较多的地方。

据印度朋友介绍，这样的藏人难民村内都有“藏独”分子布设的严密的监视系统，组织非常严密，每家每户都被要求随时提供任何信息。由于印度警察对此地不管不问，加上来往的人很多且没有身份记录，陌生人在当地很难保证人身安全。

许多在印度的藏民大多是听信了达赖集团的蛊惑而来的。其实，“藏独”势力之所以不择手段地宣传海外如何自由，就是为了扩充海外藏人数量，保持其国际影响，维持其“所谓的合法性”。

现在最早跟随达赖来印度的藏民大多已经步入老年，在当地有了第二代甚至第三代。但印度政府始终拒绝给予他们公民权，他们一直只有难民身份，没有护照，因此出不了印度。现在有不少藏民要求印度给予他们国籍。由于欧洲出现难民潮，排外倾向抬头，北美也对移民作出种种限制，每年西方国家给藏人的难民配额也非常少。对大多数年轻藏人来说，移民西方的梦想越来越难以实现。

印度本身存在严重的贫困问题，因此大多数藏人难民的生活处境可想而知。在难民村的藏民处境几乎与印度贫民一样艰苦，而且当地人一旦看到藏人难民有钱挣，就会想方设法抢饭碗，限制他们的生存空间。难民村内的大多数商店和饭店都必须雇用当地人打工，还有许多职业乞丐在难民村居住。

实际上，政治上被控制、经济的贫困以及寄人篱下的处境，已使得越来越多的藏人意识到在这里没有任何前途。一些从国内来的藏人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记者遇到一位来自拉萨的藏胞格列，他说：“吃饭不习惯，与当地人谈生意容易受骗上当，环境尤其脏乱差，我只想做几笔买卖就走了。这里比国内实在相差太远了。”

《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第1期-第205期均可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图书分馆网页下载：

<http://www.sachina.edu.cn/library/journal.php?journal=1>.

也可登陆《中国民族宗教网》<http://www.mzb.com.cn/html/Home/category/36460-1.htm>

在“学术通讯”部分下载各期《通讯》。

《通讯》所刊载论文仅向读者提供各类学术信息，供大家参考，并不代表编辑人员的观点。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100871
电子邮件：marong@pku.edu.cn